

11.03

鹿城文史资料



第三辑

88

24



鹿城文史资料

第三辑

44.166/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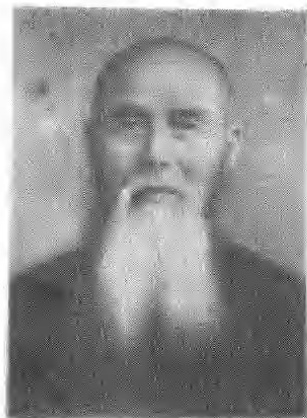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三月

前 言

区政协二届一次全会以来，我会承蒙各界人士关心和协助，通过各种渠道，积极组稿约稿，陆续征集到清末戊戌变法以来，我市工商经济、地方政况、文化教育、社会事业以及著名人物生平史料近十四万字，颇多重要。经过紧张的查核、整理、编选，赶在区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开幕之前出版了这本《鹿城文史资料》第三辑，作为向大会的献礼。由于时间匆促，本辑错误不当之处实所难免，还祈读者教正。

鹿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三月



顏 堯 (孫明)

(一八八四——一九六三年)



方 銳 (介祖)

(一九〇二——一九八七年)

目 录

前 言

图 版

徐赤文像

夏廷耀像

谢磊明像

方介堪像

手写石印的温州早期日报版面

汪仁杰摄

抗战至解放前夕温州进出口贸易……………郑加琛（1）

各个革命时期的温州工商业者……………座谈记录（19）

温州锯板业的历史情况……………余毅夫（23）

温州的报关行……………陆雨之（27）

抗战胜利后三年中温州城区几件事……………董 明（31）

忆城区解放前夕几件事……………叶 舜（37）

英商南昌轮事件始末……………冯 坚（41）

温州早期报纸简记……………胡今虚（45）

附录：《东瓯日报·发刊辞》……………陈 怀（64）

重读《东瓯日报·发刊辞》……………曾耕西 迷录（68）
黄杰甫

《瓯江日报》、《艺报》与新闻记者公会……………邱 康（70）

从艺文学堂到瓯海公学·····	胡珠生	(73)
抗战至解放初的温州电影业·····	陈国雄	(86)
温州学者在台湾著作散录·····	林文钧	(106)
记协济善堂·····	陆雨之	(112)
旧城区的三处药王殿与中药业·····	金梦良	(118)
温州天主教堂三大善事·····	郑颌丰	(123)
一代画师朱晓崖·····	杨苏流	(127)
著名水利专家徐赤文·····	徐启文	徐中业 (131)
第一位华人税务司夏廷耀·····	夏建民	(136)
篆刻书法家谢磊明·····	潘国存	(142)
先父谢磊明生平琐记·····	谢宏文	(145)
金石篆刻大师方介堪·····	叶 申	(147)
艺术生涯七十年·····	方 欣	(153)

封面题字 苏渊雷
封面设计 胡兆康
封面篆刻 陈铁生

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 温州港的进出口贸易

郑加琛

（编者按：本刊第二辑曾发表《温州开埠后至解放前的进出口贸易》一文的第一部份及第二部份第一章，今再发表它的续篇。）

第二章 抗日战争期间温州港的 畸形繁荣和逐步衰落

（1937年7月——1945年8月）

甲、温州港出现畸形繁荣的局面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我国伟大的全面抗战的序幕。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向上海进攻，至10月底前，我国许多重要的港口城市，先后沦于敌人之手。当时，尚未沦陷的沿海港口，所剩无几，温州便是其中之一。由于温州所处的位置比较偏僻，又未修建铁路，陆地交通比较不便，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中，温州尚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所以，对它封锁不严，也没有进行空袭，使温州在抗战初期，处于一个比

较安全的环境。

其实，温州港地处台州湾和浙闽交界之间300余公里长的海岸线中段，瓯江之入海口；沿岸又是沿海平原地带（包括黄岩、温岭、乐清、瑞安、平阳等县份）；有水路和公路通向丽水、龙泉、台州等地，是浙南海运交通枢纽；也是当时浙、闽、赣三省进出口货物最便捷之港口。因此，抗战初期，皖、赣、湘、闽诸省之物资均取道温州港进出。由于地理环境之优越，商旅云集，市场兴旺，使温州港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①畸形繁荣局面出现的经过

抗日战争开始时，战火还仅在我国北方燃烧。所以，温州港的船舶仍如以往一样，继续航行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没有受到阻挠。这时，温州许多商人已预料到北方战火可能会蔓延到南方来，引起海运的停顿。于是，便设法尽快地将积存的货物出运，以免造成资金积压，当年7月份运出的货物，如木板、木炭、屏纸、纸伞……等数量，比1936年同期大有增加。“八一三事变”后，日本海军即对我沿海实行封锁，全国各港口的华籍轮汽船即全部停航，使我国海上交通运输，遭到极其严重的打击。在抗战前期，航行温州港的轮汽船，除了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和美国美孚火油公司的运油船外，其余都是华籍轮汽船。当“八一三”后温州港的海运停顿时，仅上述两个火油公司的运油船舶，悬挂外国旗帜，仍继续航行温州港。由于海运停顿，温州市场上许多物资自然感到极度缺乏。为了增加市场上的货源供应，温州商人开始和英国的陶格拉斯轮船公司和乔治公司联系，派轮载运货物行驶温州。1937年10月间，陶格拉斯公司的海阳轮

(1.431吨)，乔治公司的神华轮(884吨)，分别自香港和上海载运白糖等货物来温。这两艘外轮的进港，使温州的海运和贸易开始出现活跃的气氛，成为抗战时期温州港畸形繁荣的前奏。从此开端，许多外国轮船公司便纷纷派轮行驶温州港。在此同时，温州的航商也奉到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密令，“为了保障我国轮汽船的安全，可以暂时转移为外国籍，抗日战争结束后，仍可恢复为华籍”。于是，他们便陆续地和一些外国洋行或轮船公司挂钩，将所属的轮汽船改变国籍，悬挂外国旗帜，由外国洋行或轮船公司出面经营，并雇用一名外国人担任船长，继续航行我国沿海各港口。如温州的三利汽船改名鲁德，戴元大的捷盛汽船改名民和，华盛轮船局的华茂轮改名大茂，都由葡萄牙航商出面经营。华泰船务行的通利汽船改名爱大，由匈牙利航商出面经营。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港籍的轮汽船，也都依此办理，如上海平安轮船公司的大华轮改名棠赛，上海天兴轮船公司的益利轮改名宝利，宁波宁绍轮船公司的新宁绍轮改名谋福，三北轮埠公司的宁兴轮改名德平，瑞安平轮船公司的瑞平轮改名美达，新瑞平轮改名美发……等等，分别由葡商、意商或德商出面经营，并行驶温州港口。于是，进出港的外籍船舶逐渐增多，1938年1月份即有宝利、民和等16艘轮汽船进出港，2月份进出港的轮汽船达57艘，以后还陆续有所增加，最多时每月达七、八十艘次之多。在温州港畸形繁荣期间，经常进出港的外籍轮汽船(包括华籍轮汽船改名挂外国旗帜的)共达八十余艘，分属九个国家的四十多个洋行和轮船公司(具体国籍、洋行或轮船公司、船舶名称等从略)。

②抗战时期温州港的进出口贸易

在抗战时期，温州港的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1938年不仅是温州港在抗战期间最繁荣的一年，也是建国以前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1938年进出口货物价值共达56,203,653元，比1937年增加3.56倍，比1930（不包括进出常关的货值）增加1.47倍。1938年港口的吞吐量约76万吨，比抗战前历史上最高的1930年31万吨，增加1.45倍。这一年，瓯海关税收达301万余元，比1937年增加2.02倍，创历史上最高记录。进出口贸易的繁忙景象，一直到1941年4月初才起了变化（1941年4月19日温州第一次沦陷）。

附：摘录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即1943年9月15日）永嘉县政府统计室编的《永嘉要览》中的几项有关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字，以供参改。

（九）工业：至最近止，全县工业计有518家，资本总额约2千万元。年产总值，上年度约八千五百万元（各类工业情况从略）。

（十）商业：（商业概况）自抗战开始以后，因东南各省沿海地带相继陷落，本县已成为东南唯一海滨城市，又因本县物产丰富，工厂林立，是故商旅云集，商业旺盛，俨若一大商埠也。至最近止，全县商店计有3508家，资本总额计8549万6560元（可能仅指城区而言）。

（对外贸易）本县设有瓯海关，办理进出口贸易事宜。本县进口货物大多系洋货，出口货物系本地所产土货。二十六年（1937年）进口货总值842050元，出口货总值540657元，入超301393元。二十七年（1938年）进口货总值1923513元，出口货总值6239912元，出超4316399元。

二十八年（1939）进口货总值2764834元，出口货总值11779153元，出超9014319元。自二十九年（1940年）以后，港口被敌人封锁，大船舶不能进出，故进出口贸易不正常，未有数字统计。

③抗战时期，温州港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特殊作用

抗战初期，我国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大后方属各省沦陷区的交通顿遭阻塞，正常的商品流通渠道被打乱了。当时，东南沿海，唯有温州港能发挥沟通内外货运的作用。大后方及各省沦陷区之间的工业品，手工业品，农副产品以及军需物资，全凭温州这条渠道进行交流；大后方所需的白糖、石蜡、硫酸氨、氯酸钾、颜料染料、皮革、煤油、柴油、润滑油、橡皮制品、金属及其制品、货运汽车及其另件等；棉布、百货、中西药、呢绒、针织品、南北货卷烟、橡皮靴鞋、玻璃及其制品、洋纸、文具等都得经温州转口内运；温州和大后方的内外销物资，如木材、木炭、植物油（主要是桐油）、猪油、南屏纸、毛边纸、茶叶、明矾、海产品、手工业品、手工艺品等，也需从温州出口或转口。

虽然日寇、汪伪政权、国民党政府都宣布要实行港口经济封锁，实际上，官商勾结，贿赂公行，走私之风甚盛。温沪之间的经济往来明塞暗通，在海路方面，除有外籍轮船直接往来上海、香港外，还有以沈家门、洞头作跳板，利用小轮船、机帆船或木帆船进行走私转运活动。在陆路方面，利用温州至丽水公路，南至浦城，北至金华；并着眼于杭州、宁波两地，利用兰溪、富阳、宁海等地的阴阳界进行交流。运往大后方的物资，大都利用瓯江民船运至丽水或龙泉，再用手推车运至金华，利用浙赣铁路或长途汽车转运内

地。由于温州当时具上述优势，所以敌我双方都竞相利用作为物资中转的口岸。

较能说明问题的是，负有“监督货运、征收关税”责任的瓯海关，原先只在邻近江边设立分卡；抗战军兴后，温州港出现畸形繁荣的局面，使当时的瓯海关税务司莫尔根（H·C·mohgan）惊呼“是梦想不到的事”；浙江省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当他们发现瓯海关业务繁忙，人员、机构都不能内外兼顾，立即电告财政部，增加关员、增设机构，财政部也马上批转海关总署照办。于是从1939年至1941年间，瓯海关就陆续在瑞安、鳌江及内陆的安吉、孝丰、临安、于潜、桐庐、诸暨、建德、兰溪、金华、龙泉、东阳、青田、安华、仙居、宁海、金清、石塘等处设立分卡（当时人民群众反映说：“海关变成陆关了”）。还另设副税务司办公室于金华，派有副税务司一人常驻金华办公。福建的沙埕海关也划归瓯海关管辖。由此可见，温州口岸在抗战时期经济上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

④抗战时期，温州工商业之发展

抗战时期，温州曾有“小上海”之称，当时江西、安徽、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客商，以及大后方各军区来温采办军需的人，纷至沓来，云集温州，进行贸易活动。市场繁荣，工商业发展，大小商店共有四千多家，俨若一大商埠。其繁荣景象主要表现为：

A、航运业的发展，运输服务的报关行也应运而生。抗战初期，温州港的进出口货运情况，上节已经叙述过。

1938年的港口吞吐量骤增至76万多吨，每月进出口的船舶达七、八十艘次。最盛时，温州船务行多达五、六十

家，业务较大的有华盛、戴元大、吴聚顺、三兴仁等家。由于航运事业的发展，朔门、东门各码头仓库货物堆积如山，急待疏运，因而报关转运行激增至上百家。除少数专营代客报关外，大都包办温州至金华或浦城的汽车、民船、手推车等运输业务。其中还有一家专为上海茶商运输茶叶的机构，名为“上海驻温洋庄茶叶办事处”。因战前上海七、八家茶庄有数十万箱茶叶积存在皖赣产地，无法运沪出口，唯一的途径是经温州转运出口。

B、以银行、钱庄而构成的金融市场空前兴旺。钱庄在温州历史悠久，战前曾几起几落，仅剩十余家；银行则有中国、交通、中国实业以及省银行的分支机构，还有本地集资的瓯海实业、温州商业两银行。抗战后，大批客商涌来温州，银钱业的存、放、汇款业务大大发展，银行、钱庄也随之增加。那时，温州银行是“八行一库”，即中国、交通、农民、中国实业、浙江省、永嘉县、瓯海实业、温州商业等八家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钱庄则有厚康、永丰、洪元、濂昌、顺源、鼎源等三十三家。在业务比重上，钱庄超过银行，钱庄存款比银行高三倍多，放款比银行多四倍以上。汇兑业务以温沪间往来为最大，温沪钱庄长期有挂勾，可运用本票、汇票、期票等方式便利客户，故钱庄占了优势。许多钱庄还兼做其他生意，如顺源钱庄除开设南货、油行、棉布、百货、铁行等外，还做金、纱、布、药、土特产等生意，对市场物资的囤积居奇，物价的翻云复雨有很大影响。

C、原来的工业、手工业不断扩大和发展。温州原来工业基础较薄弱，抗战前棉织厂仅有九家，全业手拉织机不到五百台，职工不满千人；抗战中因棉织品需求量很大，产品

远销湘、赣、黔、蜀等省，因而棉织业大有发展，共计发展到富华、统华等三十九家，织布机增至1725台，职工人数达3152人，资金总额为法币三亿七千三百五十万元。制革工业除原有精华制革厂外，又增设了产量更大的浙江制革厂；还有一批制面革的小作坊，技艺高，发展也快。肥皂厂从抗战初期的五家发展到十六家；针织、毛巾、锯木等厂也比战前成倍增长；文具店大多兼营印刷业务，承接抗战书刊的出版业务。此外，温州还有了几家机制和手工制的卷烟厂。由于新兴工厂增多，对冷作铁器、机械的需求相应增加，因此，毓蒙、新蒙，以及一些小规模所谓“铁工厂”也不断发展。纸伞、算盘、草席、皮件（皮箱、皮鞋、皮包、皮带等）等传统手工业品销路扩大，厂店作坊不断增多。

D、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抗战之后，一批知识分子投身工业，扩大了温州的工业门路。例如吴百亨创办西山窑业厂，方恭敏创办的清明化工厂，以及大明、中国腊纸厂等，都是依靠一批技术人员发挥作用。又如朱子取、杨学德、吴秉经等还从事具有开拓意义的研制新产品，如烧碱、机制纸、硫化碱、醋酸钠、油墨、牙膏等；康乐药厂则是温州生产西药的第一工厂；温州的制茶工业，还开始生产茶素；酿造工业技术也有新的突破，“瑞星酱油”的生产即是例子之一。这些新兴工业的发展，也为温州解放后工业结构奠定了基础。

E、批发商业和居间业蓬勃兴起。温州的商业历来有零售，也有批发，批发商业的销售客户主要是在温处两属及台州、闽北一些县份。抗战后，蜀、湘、赣、皖等省大批客商来温办货，批发业务急剧增加，获利甚巨。棉布、中西药、

颜料、五金、洋纸、文具、卷烟、煤油等是当时最红势的行业。最盛时棉布批发号多达三十余家，百货批发号二十余家，而敢于冒险与敌占区做生意的其业务业发展更快。如颜料业的益华丰；国药业的葆大、元昌参号、谢景记药栈等，都有人长驻上海，故业务业后来居上，超过益泰源、同仁、三宝等老字号。

抗战时期，土特产的交流，已超越原先以温处两属为主的状况，所以经营土特产及其居间行业也十分繁荣。当时浙江省政府搞战时经济统制，以温州为重点；于1942年前在温州组织木炭、木材、纸类等八个运销公司，垄断了土特产的经营，官僚资本的“中国植物油公司”及“清东记”，也以温州为据点经营油类业务。私营方面，最突出的是集中在西门外的山货行，一下子增加至四十余家，浙、闽、赣、皖各地的山货都有经营，一些资金较大的山货行，不仅搞代理业务，还搞自营自销。另外，抗战中温州红糖生产发展，为红糖交易作居间的土糖行也随之发达起来。

F、由于商旅云集，市场经济活跃，一般商业和服务行业也相当兴盛。不仅各种另售商业生意兴隆，服务行业更为突出，理发厅、浴室、大小旅馆发展到二百余家，并天天客满。餐馆、酒楼空前繁荣，华大利、新味雅、醒春居等餐馆，车水马龙，座无虚席。

最后，还须提到的，抗战时期的温州，囤积居奇，捣单帮做行商，开空头商行；以灵昆岛、黄华、洞头为据点进行走私活动等社会风气极盛。限于篇幅，具体情况不详述。今仅举当时流行的一些俗谚、顺口溜以作说明，“官不如商，商不如囤”，“座商不如行商，行商不如神仙（指囤积居奇

或走私者)”;当时空头商行很多，五马街中国国货公司二楼有一间空头商行，人们为它编了一首顺口溜：“二楼布置曰堂皇，经理先生无事忙，若问宝号营何业？代开发票称商行”。

乙、繁荣局面的逐步衰落

温州港及市场的畸形繁荣，是在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它本身带有极不稳定的因素，一旦战事局势发生变化，即刻就会影响到这种繁荣局面。这里，我们根据现有的资料，概述其逐步衰落的原因：

(一) 海运线上遭受日寇的掠夺

当时温沪航运，是在敌舰的炮口下通过的，日寇一翻脸，或者找个借口，连货带船全遭没收，不少厂、店因此而倾家荡产。

例如：①1939年4月局势发生急剧变化，4月20日以后，日机对温州进行频繁的空袭，其袭击目标是温州港进出口门户——东门码头及仓库等，使港口的正常秩序无法维持。6月27日，日本海军又通知各国政府，声言要对温州采取军事行动，封锁瓯江口，禁止一切船舶进出温州港，所有在温州港的外国籍船舶，限于28日前必须离港……等。因此，使当时在港的外轮，在一片惊慌声中，纷纷离开温州港，温州港进出口业务，顿时受到严重的打击；②1939年8月，十八艘木帆船满载木材、炭、纸等货物，一出瓯江口即遭日寇掠夺，损失总额约值黄金五千两；③1941年3月，一万一千余担茶叶，由九艘轮船装运上海，抵沪后被敌伪没收七千担；④1943年，三百吨纱、布、百货由沪运温，途中悉数被日寇

没收，致使温州一些布厂、棉布号和钱庄搁浅清理。

（二）温州三次沦陷，损失奇重

自1941年起，日寇接连三次侵占温州，使温州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惨重损失。总的损失无法估计。今列举有资料有统计数字可查的，在三次沦陷中工商经济直接受到损失的概况如下：

1941年4月19日至5月1日第一次沦陷期间，我市工商业经济损失总计为：16,485,473元。其中棉布业为4,063,832元；百货业为329,202元；纱线业为378,416元；转运行业为2,749,203元；颜料业为792,033元；其他各业（包括山货、南北货、油类、中西药、文具纸业、五金电料和工业）为8,140,448元。

1942年7月11日至8月15日第二次沦陷期间，我市工商经济损失总计为：12,197,009元。其中绸布业为2,091,967元；百货业为223,272元；纱线业为490,277元；针织衫袜业为372,384元；陶货居间业为319,140元；酱酒业为221,017元；中药业为204,861元；西药业为175,919元；木商业为870,086元；钱庄业为160,446元；文具纸业为201,411元；棉织工业为1,121,678元；其他行业（包括其他商业和棉织业以外的工业）为4,548,011元。

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17日第三次沦陷期间（这次时间最长），工商经济的损失，因资料残缺，今只依据一部分资料，概述如下：

（1）商业仅有木业纱线业资料。木业：据广大、森隆、鼎森、鼎泰、永源、同记、卢乾丰、源丰、协利、福源等十家统计，损失共达47,807,700元；纱线业：据黄源利、